

目 录

明、清及民国时期黔东南学校教育概述

.....戴宗荣 李藏锦 (1)

广西大学在榕江.....段前烈 (12)

攻克文化堡垒.....乐曼云 (19)

旧州人民迎解放——记父母亲

在黄平旧州的革命活动点滴.....张小宁 张端端 (24)

解放初期镇远县工商联活动点滴.....王玉衡 (32)

解放前下司工商业的兴衰.....唐纯理 (39)

回忆榕江木商概况.....曾振华 杨长庆 (46)

话丹寨采矿.....杨通云 (52)

凯里造纸厂简介.....石镇湖 (55)

南明地区侗族人民的抗暴斗争.....陈远卓 (59)

光绪庚子年的凯里事变.....赵朝辅 (68)

六合团苗民抗粮抗款记.....张泽夏 (79)

韦洪彬造反.....韦寿山 龙向日 (87)

王子良造反始末.....杨 真 (92)

杨昌隆其人其事.....喜 农 (98)

革命烈士、八寨县长王定一.....	陈若尘 (121)
我所知道的张止爰.....	朱法兰 (124)
民国时期剑河县历任县长简介.....	陈远卓 (131)
解放前榕江县几任县长的贪与廉.....	易耀宗 (147)
杨西横政风点滴..... 李文升	李光厚 (153)
思念王名称先生.....	唐 静 (161)
国民党陆军通校在麻江.....	潘海清 (165)
“京滇公路周览团”荇镇纪实.....	方宗佑 (171)
王家烈夺取贵州政权前后.....	余翰屏 (174)
回忆以往几十年.....	杨长庆 (178)
革东事件纪略.....	陈学志 (190)

质 疑 · 补 充 · 订 正

对《解放榕江前后经过》一文的几点订正.....	赖文彬 (201)
黄质夫先生离校的真相.....	龙远贵 (203)

明、清和民国时期黔东南学校教育概述

戴宗荣 李藏锦 搜集整理

元代黔东南没有学校的史料记载和传闻。明永乐十一年（公元一四一三年）贵州列为行省。当时思州（今岑巩）把宣慰司学改为府学，这是全州第一所官办学校。这以后，各府学、州学、县学相继建立。终明之时，共建学校十所，即思州府学、镇远府学、黎平府学、黄平州学、天柱县学、清平（凯里市炉山）卫学、铜鼓（锦屏）卫学、寄思州府学的清浪（镇远县青溪）卫学、寄黎平府学的五开卫学、寄镇远府学的偏桥（施秉）卫学。清代增建五所，即永从（从江）县学、古州（榕江）厅学、兴隆（黄平县重安江）卫学、麻哈（麻江）州学、八寨（丹寨）厅学。除三穗、台江、剑河、雷山外，全州各县都有了“学校”这种教育机构。

各府、州、县（厅、卫）学属于地方官办学校。各校都设有孔子牌位，每月初一、十五都要祭孔，生员以诵读儒经为主，所以府、州、县学又通称儒学。地方儒学有大、中、小之分。这种分类不是按学生程度，而是按进取生量之数。进取文生十五名以上的，称大学；八名至十五名的，称中学；八名以下的为小学。一般府学为大学，州学为中学，县学为小学。

由于我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一贯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少数民族学生进校读书非常困难。明成化十七年（一四八一年），统治阶级始“令土官嫡子，许入附近儒学”，开地方儒学招收少数民族之先例。但能进校的很少，即使进了学也受到种种刁难，被加以“冒籍”而排挤出去。清雍正以后，情况稍有好转。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地区进一步推行“改土归流”的政治措施，加强其地方政权的统治，除了用“剿”的一手之外，同时还兼用“抚”的一手。比如规定在科举考试中，各府、州、县学每届乡试时必须录取苗生（泛指少数民族学生）一、二名，“以示奖拔”。尽管统治阶级的目的是要用封建礼教来强化人们“忠君事上”的思想，但这种规定对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是有一定作用的。

明清时期，除地方儒学之外，黔东南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还有社学的设立。我国社学之设，始于元代。元行政设置，县以下设“社”，五十家为一社。各社自聘教师办社学，择通晓经书者为师，农隙使子弟入学。明承元制，统治者诏天下立社学，利用它来“导民善俗”。初入社学，八岁以下的，先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属发蒙阶段。八岁到十五岁的为第二阶段，学习内容包括御制大诰、本朝律令及冠婚丧娶之礼和《四书》、《五经》等文义典故。达到要求的佼佼者还可补当地儒学生员。镇远府的社学是贵州最早创办的社学之一。建于明嘉靖三十二年（一五五三年）。学校规模不大，只有楼房一间，上为童生读书处，下为教读所居。其余社学，如古州、八寨、小丹江（雷山）、清江（剑河）、施秉、凯里、丙妹、朗洞、柳霁（天柱）、永从，都各有社学一所。清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

年)以后,统治阶级以社学“不能导人以善,转恐其相诱为非。且苗性愚蠢,欲其通晓四书义理甚难,而识字之后,以习小说邪书则甚易,徒启奸匪之心,难取化导之效”为由,对社学进行裁革。从此,社学江河日下,渐为义学取代。

义学亦称义塾,是私人捐建或宗族设立的乡校、村学,是免费的蒙学。经费基本上来源于地租。塾师由各义学自聘。在义学读书的人,没有严格的年龄限制,一般是少年儿童。为我省少数民族设置义学,始于清康熙年间。康熙四十四年(一七〇五年)议准,贵州各府、州、县设立义学,将土司承袭子弟送学肄业,以俟袭替。其族属人等並苗民子弟,愿入学者,亦令送学。至雍正时,对少数民族子弟入学招收面扩大了一些。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年)令各省自立生祠书院改为义学。苗人子弟情愿读书者,都许入学。此后,又陆续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了一批义学,用义学做工具,来“训导”少数民族。雍正年间,贵州巡抚张广泗在《设立苗疆义学疏》中说得很清楚:“新附苗疆广袤二、三千里,入户不下数十万,並经题请,安设营制,以资际维,酌立专官,以司教养,于抚导绥戢之余,必当诱植彼之秀异者,教以复习礼义,庶几循次陶淑,而后可渐臻一道同风之效。是所请设立义学,课海新附苗人子弟,实为振励苗疆之要务……”

由于统治阶级为了缓和民族矛盾,加强对少数民族的思想控制,以巩固其统治地位,把设置义学作为“要务”来提倡,又有没收被镇压起义的农民的所谓“逆绝”的财产作为办学经费,所以义学曾发展到相当规模。全州各地共建义学六十七所(处)。其中镇远四所,黄平一所,施秉四所,岑

现两所，天柱两所，锦屏一所，黎平八所，从江十六所，雷山三所，剑河一所，台江一所，凯里一所，麻江一所，丹寨十二所，榕江十所。

这些义学，一部份在咸同年间毁于兵火，一部份因风雨所坏，大部份到清末兴学堂废科举时改成了小学堂。统治阶级办义学的目的，是为了保其长治久安，但客观上却使边远山区的少数民族增加了读书的机会。据有关记载，“改土归流”之后，黎平府的苗族“悉心耕凿诵读为事”，而且“亦多读书应试”，黄平、清平一带苗族读书应试，“见之多不识为苗”，入科者颇多；台拱厅、清江厅一带苗族“多有读书明理者”。这些史料说明了在苗疆设校的历史功绩。

书院在明清时期，亦是一种教育组织形式，而且属于高一级学校，教的都是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秀才或童生。书院主持人称院长、主讲或山长，一般都由学者担任。教学方法多采取问难答辨形式，注重自学，培养能力。书院实行“门户开放”，允许不同学派进行讲学，遍求名师。如黎平府属的黎阳书院，“曾延请浙湖名宿来主讲”。

黔东南书院，皆是在明清两代先后建立。明正德、嘉靖年间，天柱在瑞莲池畔建凤山书院，黎平在南泉山麓建天香书院。到清代，各地增建书院共三十九所。这些书院，尽管宣讲的东西有不少糟粕，但在沟通中原文化，促进文化发展方面，有一定积极作用。

由封建教育派生出来的科举制度，是封建统治者选拔官吏，笼络知识分子的一项重大措施。贵州儒学少的时候，没有设乡试考场，生员要到湖南、广西、云南赴考，很不方便。到明嘉靖年间，才获准设科场，为读书人打开科举仕途

之门。明代，全州考中进士二十一人，举人二百四十五人。清代，考中进士六十三人，举人三百四十五人。影响较大者，当推孙应鳌、何腾蛟、夏同和等人。孙应鳌，清平卫（今凯里市炉山）人，明嘉靖三十二年（一五五三年）进士，曾任户部右侍郎、南工部尚书。任陕西提学副使时，作崇制、订学、论心、立志、破迷、规让、飭礼、励勤、戒速、博理、讲治、进业、惇友、养蒙、严范等十五条檄文勉励诸生，很有成效。后来经他考选的学生，在社会上都有相当地位。万历年间，他在太学里讲学，任国子监祭酒（相当全国唯一的大学校长），给皇帝讲解过经书，很得皇帝赏识，死后追赠太子太保，谥文恭学者，称淮海先生。留下《淮海易谭》、《学孔精舍》等十余部著作。后人曾评论：“先生以儒术经世，为贵州开省以来人物冠，即以词章论，亦未有埒于先生者也”。何腾蛟，黎平人，天启举人，由南阳知县历官湖广总督。得李自成旧部农民军合作，同御清军。桂王立，为武兼大学士，后遇难于长沙，谥文烈。麻江夏同和，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考中进士第一名（即状元）。是贵州置省以来三个状元（两文一武）之一。曾任湖南省主考，江西省实业厅长。平生工文善书，有名当世。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之后，我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逐渐传入中国。一批志士也向西方学习寻求真理。因此，在文化教育方面，产生了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转变时期。这一时期，不仅政治上有一些改良，而且教育上也

有所革新。清光绪年间，康有为、梁启超主张变法，推行新政，废科举，兴学堂，维新之学，风靡全国。贵州由于有戊戌变法的铁腕人物李端棻等人的影响，情况也是一样。这时期，黔东南办有高等小学堂十九所，学生一千一百多人；初等小学堂八十二所，学生一千五百多人。一九〇八年，丹寨设有师范速成科，丹江设师范传习所，学生共一百七十余名。小学堂开设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体操等课。教育宗旨为“忠君”、“善孔”、“尚公”、“尚武”、“尚实”。这五条十字反映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学思想，其目的在于使受教育者在忠君、善孔、爱国、宗法的思想统帅下，用自己的科学技术知识、军事知识为封建统治者服务。

民国初年，学堂改称学校。原设在县城的两等小学堂改为两等小学校，农村的初等小学堂改为国民学校。学制七年，高级四年，初级三年。废四书、五经课，设国文、数学、英语、常识、音乐、美工等课程。辛亥革命以后，提倡男女平权，一些交通沿线的县城还设立了女子学校。这期间，全州各地增设的学校不多，从文化较为发达的黄平县来看，也只有县属第一、第二、第三高等小学，二十四所国民学校，两所女子高小，五所女子国民学校。民国八年才共有学生七百九十余。这一时期，虽然提倡办新学，接受西方文化，学些声、光、热、电之类的东西，但尊孔读经的私塾仍是城乡教育，尤其是启蒙教育的重要部份。据天柱县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的统计，这个县有私塾二百零四所，私塾先生二百零四人，学生三千四百余人，而到一九二一年，全县才有国民学校一十三所，在校生一千三百余人。其它各

县的私塾也大概如此。

学校的教育经费，从清末到民国军阀统治时期，一部份是由原书院、义学的田租拨给，另一部份是从庙田、屠捐和斗息中开支。这些经费，多被当地豪绅把持，中饱，造成教育经费的枯竭、短少。学校设备简陋破旧，教员薪金少而且难以按时支付，多不安心工作，因而教育事业停步不前。《麻江县志》载：民国初年，“屠斗捐为四乡挪用，城中学校仅存两等小学各一班，乡校则下司、新场、羊场三所而已，……十三年，滇军寇黔，麻属各校受躏，弦诵竟辍，校舍亦多毁”。由此可见各县教育的一般状况。

一九三五年（民国二十四年），蒋介石取代军阀统治贵州后，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东北、华中、华南等的一些学校向西南内迁，黔东南教育事业有所发展。一九三八年，国民党政府推行“新县制”，实施国民教育，规定每县设民众教育馆一所，每乡（镇）设中心国民学校一所，每保设国民学校一所，吸收儿童、成人、妇女入学，使民众教育与业务教育打成一片。据一九四一年《贵州教育概况》统计，各县共设有中心学校五十九所，国民学校六十五所。设在台拱（台江）五岔乡的初级小学，丹江（雷山）长丰乡的初级小学，镇远师范附属小学，黄平加巴乡的初级小学，丹寨长青堡的初级小学，为省立小学，共有学生一千一百余人。中等学校共有九所，分布情况是：麻江县立初级中学，五个班，共有学生318人；剑河县立初级中学，两个班，学生85人；天柱县立初级中学，五个班，学生380人；黄平县立完中，五个班，学生171人；丹寨县立初级中学，两个班，学生87人；国立贵州（榕江）师范学校黎平初中部，三个

班，学生168人；贵州省立镇远师范学校初中部，四个班，学生160人；黄平旧州私立中正中学，四个班，学生218人。总计初中八所、完中一所，三十三个班，学生1,745人。

国民党统治贵州后，分五个学区，抓了师范教育。四十年代，全州有两所师范学校和三个简师班，即国立贵州师范学校，在榕江县城；省立镇远师范，在镇远县城，黄平中学附设简易师范一个班，剑河初级中学附设简易师范一个班，施秉简易师范一个班。上述师范学校和简师班共有中师六个班级，学生二百余人；初师九个班，学生四百余人。

职业教育很少，一九四二年，仅锦屏有一所省立锦屏农林科初级职业学校，七十一名学生。

在中等学校中，办得较有特色，影响较大要数国立贵州师范学校。国师的前校是设在贵筑县青岩乡的省立青岩乡村师范。一九三九年冬初，乡师南迁榕江县城，改名国立贵州师范学校。主要招收黔、桂、湘边区的少数民族子弟，为发展边疆教育培养师资。学生享受公费待遇。学校设师范部，简师部和初中部。学生最多时有十六个班。一九四二年，师范部有学生107人，简师班有283人，初中部321人，还有部分考不取而又无力回家，留在学校一边劳动一边补习，一年后转为简师生的工读生。国立贵师的黎平分校只设初中部。第一任校长黄质夫，南京大学农学系毕业，留日农学家。抗战前任江苏栖霞师范学校校长，办学有经验。他订的校训是诚、勤、公、毅，要求学生紧张，严肃。国师是全日制师范，开设语文、数学、历史、地理、教育概论、心理、动物、植物和公民等课，又办有工场、农场，组织师生

参加种田、种菜、养猪、织布、木工、编织、缮写、图画等各种劳动。国师教育学生热爱教育事业，办了附小和村寨小学实验区，将应届毕业生分到那里进行实习。国师在榕江办学十年，为黔、桂、湘三省，特别是黔东南培养学生一千名农村师资和有文化的人，其中不少人解放后成了党政领导干部和教育科研单位的骨干，对黔东南的文化教育事业有过重大影响。

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蒋介石集团急于发动内战。在“质量重于数量，维持重于发展”的借口下，国民学校停办不少。中等学校停滞不前，一些为逃难迁来的学校开始回迁，人才外流，教育事业每况愈下。虽然国民党政府把教育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但乡村学校的经费是难于征服的“公教粮食”中拨给，很难按月支付，中学教员虽可领取薪金，但货币天天贬值，物价日日上涨，教师难于安心从教。“教师待遇至为菲薄，确难维持最低生活”。贵州省第一行政区（镇远专区）督察专员刘时范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刘时范在视察各县的情况报告中还说道：各地“资金难筹，中小学大都简陋不堪”，连“教育可谓尚佳的黄平县也师资缺乏，各乡中心学校及保校设备简陋，图书缺乏亦在所难免”。

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党推行所谓国民教育制度，是其法西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份。各县中学，乡镇中心小学和保国民学校校长，都由县长、乡长、保长担任或兼任，在学校推行法西斯教育，建立三青团组织，开展军事训练和童子军训，要青少年树立“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的旧道德信念，妄图使学生成为尽忠于四大家族的驯服工具。

总的说来，民国时期的教育，虽有一定的发展，但由于城乡生产凋敝，民穷国弱，灾祸频繁，民不聊生，这种发展是有限的，特别是广大边远落后山区，很少有学校，居住分散、生活贫困的农民无力送子女读书。一九四九年全州仅有小学五百九十七所，在校生42,050人；中学十六所（含完中四所），在校生2,906人；师范学校两所，在校生379人；教师不足两千人。按当时一百七十万人口计算，平均每千人中仅有小学生24.7人，中学生1.7人。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为19%。每百人中只有2.7人识字，文盲占总人口的97.3%。许多偏僻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农民刀耕火种，极端贫苦，常用结绳、刻木、数豆粒的方法来记事；一些较大的村寨或房族不得不集资请人读书。

旧中国，为发展黔东南教育事业做出贡献的社会贤达和文人学士不乏其人。有的捐资办学，有的弃政从教，有的呕心沥血，舌耕一辈。如麻江县人周恭寿（铭九）积极筹建麻江中学。一九二七年出任贵州第一任教育厅厅长前后，为解决中等教育的合理布局，促进教育的发展，作了不少努力。天柱人周竹铭，侗族，一九八一年于贵阳桑蚕学校毕业后，在天柱县城办过桑蚕女子学校。黎平县人王鸾娇（开媛），女，丈夫死后，她将胜诉后的赔偿银三百两捐出，办起了黎平第一所女子小学。黎平人，赵学煊，一九二〇年留日归国后，拒绝军阀当局聘他政界任职，回到黎平，扎根桑梓，献身教育，在黎平中学当过校长、主任，教过多门功课，四十余年如一日，直至一九六六年病逝。这些人致力于发展教育的决心和实践，是令人难忘的。

由于中国共产党、进步人士和进步书籍的影响，以及个人的刻苦努力，自治州也出现过一些驰名中外的著名人物。如著名作家、文史学家、教育家、凯里市炉山人张毕来教授，著名物理学家、锦屏人龙咸灵教授，等等，解放前大都曾在故乡发蒙读书，刻苦攻读，成为对人民有贡献的人。

广西大学在榕江

段前烈

抗日战争时期，广西大学从梧州蝶山辗转内迁，最后，于一九四四年夏，迁到贵州榕江复课。汉民中学、德智中学以及桂林师范学院、桂林儿童教养院等单位，也经此地迁往贵州平越县（今福泉县）等地复课。随同各院校疏散来的难民，形成一股人流，不断地向榕江涌来，然后又陆续向三都、都匀及贵阳等地流去。那时，榕江街上，熙熙攘攘，难民们到处摆满地摊，廉价拍卖各式各样的衣服行李和各类家用什物。城区人口激增，住房十分紧缺，有的单位不得不住到近郊车江一带的村寨里。有人估计，当时榕江城区人口约有五万多。

广西大学迁到榕江后，借用一些会馆公房作为临时校舍。教师们全是租赁民房居住，人多房少，拥挤不堪，生活与工作条件极为艰苦。但是，在教学工作中，他们那种勤奋好学，热心教育，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学者作风，给人们留下难忘的印象，令人敬佩。如讲授流体力学的冯德泰教授，一家五口人，住在我家一间不足十六平方米的小房间里，每晚必待家人熟睡后，才一人在昏暗的油灯下潜心阅读、钻研、撰写讲稿，工作到深夜。类似这种情况，在教师

中是很普遍的。

当时西大共有法商、理工、农三个学院。法商学院设有法律、政治、经济、银行会计及工商管理等系；理工学院设有数学、物理、化学、土木工程、机械工程及电机工程等学系；农学院设有森林、农艺、园艺及畜牧兽医等学系。全校共有六十几个班级。随校迁来的学生约有一千二百余人，教师二百余人，职员、工人及校警二百余人，连同家属，全校共计大约近四千人。

校部办公室设在四川会馆（现在的盐业公司仓库）及其后面的张公祠内，教务处、训导处及总务处均在此办公。校长办公室设在古州东路一间民房里。上课的讲堂，除借用国立贵州师范、榕江中学及小学的部份教室外，还在两湖会馆（现在的木器加工厂）、江西会馆（现土产公司废品仓库）及贵州会馆（现在第四小学校）、演武厅礼堂（原国民党区公所，现场坝猪市处）等馆庙的大殿、戏台和酒楼上下用木板铺成简陋的教室。即使如此，教室仍不够用，师生们常常利用教授租住民房的堂屋作临时课堂；晴天，有时也在榕树脚下或院坝内，露天讲课。

抗战期间，物资奇缺，尤其是在抗战后期，通货膨胀，法币一直贬值，教职员工收入微薄，他们忍受着国难期中的各种艰难困苦。克服种种困难，节衣缩食，仅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子女多的教师，常常靠变卖衣服首饰来补充生活费用，学生中的绝大多数断绝经济来源，靠吃公费伙食。由于副食费有限，只能裹腹而已。尽管他们由近海城市迁到边远闭塞的山城，由宽敞舒适的教学大楼变为破旧馆庙改装的临时课堂，由明亮的电灯变为昏暗的煤油灯甚至植物油灯，

备尝颠沛流离、长途迁徙之苦，但是，他们那种诲人不倦，学而不厌的奋发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浓厚的学习风气，以及珍惜时间，因陋就简，尽快复课的责任心与迫切感，给榕江各族人民留下极为深刻的良好印象，对榕江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过积极深远的影响。

农学院的奶牛饲养场，设在对门河关帝庙（现在的精神病院）内。当时，本地人第一次有机会看见驰名全球的荷兰奶牛。榕江城区第一次有鲜牛奶饮料供应。市面上，小型咖啡馆和西餐厅也应运而生。

当年西大校长是李运华教授，教务长是汤藻真教授，训导长是崔华伍教授，总务长是石兆棠教授，理工学院院长是郑建宣教授，农学院院长是汪振儒教授，法商学院院长是高巩白教授，其后，是吴求胜教授。

学生宿舍在中山公园（现新菜市场及人民银行附近）内，现在菜市中心的售货棚一带，就是当年西大校园里墙报林立的地方。各院系各种学会与各班级的墙报，排版美观，缮写工整，内容丰富，通过墙报、黑板报，曾转载过毛泽东同志著作《论联合政府》，传播马列主义，发表不少学术论文及进步文章。

一九四四年夏季，西大在榕江补招部份新生，入学考试的考场设在榕江中学礼堂内（现今教育局办公楼的地址）。本县学生胡肇漠考入农学院森林学系，周光耀、陆秀伟考入法商学院政治学系，我考入法商学院经济学系，刘志飞考取贵州大学后转入西大理工学院化学工程系。现在贵州工学院执教的刘志飞，就是西大为我县培养出来的第一位副教授。

西大刚迁来时，大东门城墙上挂有几颗用以示众的“匪

首”首级。首批到达榕江的同学们，亲眼见到这种血腥的野蛮行为，深为惊讶，并对现实表示强烈的不满。在他们的心目中，边远县城的县长，其野蛮残忍的程度，不亚于中世纪的统治者，给人们的印象极坏。出人意料的是，西大在榕江中学操场举行的一次纪念周集会上，校长李运华竟然邀请榕江县长刘仰方向同学们讲话。当时，同学们对此相当反感。刘身着一件破旧的黄棉军服上装，特意装扮成很朴素的样子，然而，由于他饱食终日，大腹便便，尽管外表穿着朴素，也掩饰不了他那酷吏的形象。他讲了《榕江及其沿途的治安情况》，只因为初来乍到，出于礼貌关系，同学们才没有当场报以“嘘嘘”的嘲弄之声。

记得在一节历史课上，讲授《中国通史》的黄现藩教授，在讲到避居深山的苗族同胞，其服饰上至今还保留有“图腾”的痕迹，还沿用原始的生产方式，生活极为贫困时，他突然半开玩笑似地插上一句：“凡是当过县长的，拉去枪毙，没有一个冤枉！”引起哄堂大笑。同学们十分赞赏教授说话爽直。

一九四五年夏季，由西大学生自治会在两湖会馆内组织召开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学生大会，也有部份进步的教授、讲师和助教参加。大会在与会同学中临时推选出的两位大会主席主持下，讨论了国内外形势，会议开了几个小时，经过一番激烈辩论，大会通过决议：向国民党中央政府发出代电，要求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局面。开会时，有两名军人不顾会场门口执行纠察任务的同学劝阻，强行进入会场，经大会主席与之交涉后，随即自行退出会场。当时虽然未发生警特冲击会场或其他可怕事件，